

松江文史

(第十一期)

纪念松江解放四十周年专辑



政协松江委员会文史组编

目 录

为永不忘却而纪念·····	姜云生
解放前夕的战斗——“淞沪地委”南下后琐忆·····	顾复生(1)
为了早日得到解放·····	奚天然(5)
解放松江散记·····	叶 恭(10)
忆接管松江县的南下干部队伍·····	张志全(13)
接管松江几件事·····	施永兴(16)
解放前夕“学习图书馆”的活动·····	赵秀洲(18)
迎接叶榭解放及剿匪肃特斗争的回忆·····	陈炎培(21)
渡江后进入松江的日日夜夜·····	黄玉石(23)
解放松江点滴回忆·····	韩夫荣(25)
解放初资遣散兵游勇纪略·····	谭俊升(26)
松江解放见闻·····	陶而文(27)
一个居民的松江城解放目击记实·····	唐舜华整理(29)
新桥解放前后·····	邹 辉(30)
解放初期的松江工人运动·····	顾伟民(32)
记建国初涤荡污泥浊水的斗争·····	金石声(36)
解放初期松江剿匪肃特概况·····	江根泉(3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松江县委员会简况·····	施圣闻(42)
我在松江县政协活动中的回忆·····	杨秉文(44)
忆述我县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秉钧(46)
解放40年来松江经济建设简况·····	王健民(52)
40年来松江教育事业的回顾·····	朱献成(56)
松江电影放映事业40年·····	蒋正基(65)
解放后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商业——建中贸易公司·····	陈大年(75)
松江县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推广追记·····	干 城(76)
上海松江纸浆厂发展史实·····	陈炎培整理(78)
松江一中见闻·····	吴仲炳(80)
松江解放40周年(诗)·····	张联芳(封2)
庆祝松江解放40周年(篆刻)·····	梁景惠(封3)
纪念松江解放40周年(诗)·····	封用拙(77)
南歌子·纪念松江解放40周年(词)·····	梁景惠(83)
祖国40年(诗)·····	王尚德(84)
忆解放大上海(诗)·····	郑云梯(84)

解放前夕的战斗

——“淞沪地委”南下后琐忆

顾复生

为了开拓巩固淞沪地区的工作，增强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力量，1944年冬，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成立“淞沪地委”。由苏中区党委抽调陈伟达、顾复生为地委书记及地区行政专员。我们奉命后，即于1945年1月，从苏中渡海，南下浦东，与淞沪支队会合，同年3月，地委机关率淞沪支队飞渡黄浦，到达浦西。当时，“淞沪地委”干部班子是：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姜杰、地委委员兼淞沪地区行政专员顾复生、地委委员兼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金子明、地委委员兼淞沪支队政治处主任曾平、地委委员兼淞沪支队参谋长张席珍、地委委员陈正之。

“淞沪地委”率淞沪支队浩浩荡荡抵达浦西后，即展开以下工作。

（一）消灭敌特殷丹天

殷丹天原本是一个江湖医生，家住上海西郊虹桥路。抗战期间，他夤缘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部下，因善于逢迎，得到了戴笠赏识，并收他为门生，于是青云直上，官运亨通。1938年，他率领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直属第二大队到达沪郊青浦东乡。这年的3月中旬，在一次“沪西近郊头面人物交朋友大会”上和我相识。这次交朋友会开得很成功，通过大会，我们结交了松江北部、上海西

郊、嘉定西北部及青浦以东昆山以南等地区的不少新朋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不论党派、阶层都是争取团结的对象，只要你“抗日”，我们都欢迎。但其中也不无隐藏危机，当时若忽视了阶级斗争，那就会犯右倾错误。因为这些朋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其中除国民党的游击队外，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无业流氓、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阶级立场不同，思想各异，动摇性大，今天随着革命高潮而来，他日甚至会随革命低潮而去，患得患失，极易叛变。虽然如此，但也不可因噎废食，是要积极地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所以对殷丹天其人，我总是注意加强对他的团结，以期并肩抗日。不意从以后他的所做所为，证明殷是一个挂着“抗日”招牌，忠于反动主子反人民反革命的死硬派，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1945年1月，当我率淞沪支队先遣队抵达浦西时，殷丹天奉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特务头子戴笠之命，率领小部队来到青浦东乡蟠龙地区，挂起堂堂“抗日”招牌，在那里招兵买马，从他原来的三十多人小部队，激增到一百多人，并派人前来与我联系。殷过去曾与我合作，但他不忠诚，1940年我撤离青浦后，他竟假冒我名义，骗取了后备队的枪枝，削弱了人民

抗日武装。这次我返回浦西，他又虚情假意派人来和我联系。对这个不抗日、专扰民、搞分裂的特务，我只有苦口婆心地要来人转告他，叫他悬崖勒马，不要再危害人民，一切要以抗日为前提。然而殷丹天这个死不悔改的特务，当淞沪地委前来浦西时，竟又在柿子园地方，突然对我袭击，致使我淞沪支队政治处主任曾平和青东工委书记康则焘不幸牺牲，他又一次犯下了扼杀抗日队伍的滔天罪行。又如据以后查悉，1941年2月我“青昆支队”参谋长周达明率队进至淀山湖谢石关时，遭到“忠救”阮亚丞部一千多人的围攻，在激战中，周达明同志和范守廉中队长及全军八十余人壮烈牺牲，就是殷丹天事先把情报送给阮亚丞，在淀山湖畔打了“青昆支队”的伏击。

为了消除浦西隐患，打开进军淀山湖大道，淞沪地委决定，坚决歼灭殷丹天及其所属部。

殷丹天在柿子园向我袭击后，因慑于我军威力，即率部逃逸。直至1945年6月中旬，侦悉殷部正龟缩在青、昆、嘉三县交界的赵屯桥一带，和嘉定顽匪张龙云聚集在一起，他们西联淀山湖的国民党保安九团，东与驻白鹤港日寇及伪军蒋阿考相依靠，企图合力阻止和打乱我西进部署，隔断我与苏、常、太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当时，我向松江西进的淞沪支队衡山大队，争取了盘踞在天马山地区的徐柏堂游击队及小昆山钱某的游击队与我和平相处，从而使我军顺利越过泖湖，进入青西小蒸、练塘等地，并趁机在驻练塘的日寇下乡抢粮时，予以痛击，毙伤日寇十余人。此役，我军牺牲了4位指战员。这一仗，更进一步激励了当地人民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许多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参加我淞沪支队。我当时奉命留守青东，并在李浦桥潘书云老先生家，

代表地委向西进的衡山、泰山、华山、崂山等部，作了动员报告后，即由政委陈伟达、支队长朱亚民亲自率队出发，直指赵屯桥。

一天，淞沪支队的侦察员，在赵屯桥镇进行工作时，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采购员，经侦悉这个采购员就是殷丹天的事务长。他们除将这一发现飞报支队部外，就对这个采购员进行跟踪、监视，在其回归的半途，将他逮捕到支队部。经讯问，得悉殷、张两部宿营于赵屯桥西北的蔡家浜村。我军立即出动，以一个战斗队警戒白鹤港方向的敌伪，防其趁机骚扰，以三个队迂回包围蔡家浜村。合围后，张龙云见势不妙，率亲信落荒而逃。殷丹天在率部顽抗时，被我击毙。战斗不到一小时结束，除生俘敌特一百多人外，缴获殷、张部的大量枪枝弹药，敌特们炫耀一时的美式武器也全部为我所有。另外，缴获电台两架（其中一架是美式），连同报务员、机要员和来往电稿。还搜缴到上刻有“殷丹天戴笠赠”字样的金质图章戒指一枚。

殷丹天被击毙后，所部就歼，人心大快，而其幸存的喽啰们，却在青浦北郊轮船码头上，挂起殷丹天照片，为其招魂开吊，还把上海市虹桥路殷丹天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改名为“丹天小学”（上海解放后，恢复原校名），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侧目。殷丹天终于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历史罪人，永远不齿于人类。

（二）进军淀山湖

1945年春，粟裕司令率新四军一师抵达浙西天目山地区，在那里反击国民党军进袭时，歼灭顽敌三个师。当时，因天目山区吃粮困难，移师长兴后，趁胜东进湖州未果。乃直趋吴江县的震泽，并与该县工委书记金佩杨取得联系，准备与我淞沪支队会师淀山湖。为此，我淞沪支队歼灭殷顽后，即分兵

两路，挺进淀山湖。一路由张锡祚率领衡山大队，由淀山湖南部向浙江嘉善县俞家圩方向前进；一路以泰山、华山、崂山三个队由陈伟达、朱亚民率领，从淀山湖北部直指金泽、陈墓。当我大军进至西大盈万寿桥时，有不明番号伪装日寇的匪部，突向我进攻。经挥戈反击，匪即仓皇西窜，因时已天黑，我军也未予追击。

一天晚上，当我军在淀山湖畔一个小村庄准备宿营时，反动的保九团突向我偷袭。遭我反击后，保九团未敢恋战，溃逃时，被我俘获3人、缴获步枪3支。据供称保九团共约二百人，每连只有二三十人，战斗力薄弱。

淞沪支队继续前进中，接浦西急电，得知日寇已于8月14日无条件投降，要淞沪支队迅速班师，以便监视上海市的伪军活动和准备随大军接收上海市。于是淞沪支队乃星夜兼程，赶回青浦东乡。

（三）日寇投降前夕 准备接收上海

1945年8月15日的早晨，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长胜同志，派人送来一份急报给“淞沪地委”，内云：“……日寇偷袭珍珠港得逞后，冲占上海租界时遭捕的苏联侨民，昨晚（十四日）日寇忽将他们全部释放，这些被释的侨民，就在法租界辣非德路等地的马路上狂欢歌舞了一整夜，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午后，又接到刘长胜同志送来的急报说：“已查明，苏联红军和英、美、法联军，攻占柏林，消灭希特勒后，即回师西伯利亚。现苏联百万大军已进抵我国东三省境内，驻防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全部被迫缴械（注：关东军是日本的精锐部队，其40万人一直驻守我国东北，日本侵略者，是以此来对付苏联红军的），日本天皇已于8月14日下诏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电报最后说，“提高警惕，密切注意上海市

周佛海伪军的动态”。我们接到以上急报后，即电告陈伟达、朱亚民同志要他们迅速回师青东，共商一切。在陈伟达、朱亚民同志率队星夜赶回后，我们即根据当前情况，研究决定：除向浙东区党委报告请示机宜外，并将部队和地专机关移至沪西华漕附近，以便就近和上海刘长胜同志取得联系。一面我们把日寇无条件投降这一特大喜讯，公告广大群众。一时人心振奋，万民欢腾。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同志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命令，各解放区和根据地的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张执一同志也很快赶来“淞沪地委”，准备就职。随着喜讯，纷纷传说，浙西、浙东和苏北的三路大军就要开来接收上海。淞沪地委和上海市内人民闻讯后，更加欢欣鼓舞，热烈准备迎接我大军到达。这时还传说：“淞沪支队”也要随接收大军开往上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由胜利带来的喜悦气氛，弥天盖地。

以后，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为了顾全大局，求得全国和平团结，决定我军不去接收上海，并放弃长江以南的所有革命根据地，凡在根据地内的人民武装、工作人员一律撤往长江以北。这是为了求得全国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的英明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四）北新泾开敌和七宝战斗

日寇投降后不久，上海市周佛海的一个伪税警大队，突然西移到北新泾镇，蠢蠢欲动。我舟山部队队长黄友梅侦得以上敌情后，淞沪支队即派杨明德、翁阿坤、黄友梅等率领舟山、泰山两队向北新泾方向进行武装侦察，相机收缴该伪警大队的枪枝。军行至陈思桥时，忽有青年数十人，骑了脚踏车，风驰电掣地赶到队伍前，兴致勃勃要求随军去北新泾收缴伪军枪械。

当我先头部队到达伪军阵地后，战士们向伪警抛去手榴弹数枚，高呼缴枪不杀，并勇猛冲入伪军阵营时，伪警们发觉是新四军来了，纷纷弃械，仓皇向上海市区逃窜，我军收缴了这个伪警大队的全部枪械，计轻机枪二挺，步枪一百八十多枝。参加战斗的当地青年，把缴获的战利品架在他们的自行车上，满载而归，镇上的人民，都在欢呼跳跃，高喊：“打得好！”“打得好！”

收缴北新泾伪警枪械后，大约相隔五六天，周佛海的伪军两个团又进犯到我边区七宝镇。当朱亚民支队长率领泰山、舟山两部及泗宝区队前去收缴该伪军枪械时，这股伪军竟凭借青沪公路七号桥西边的大碉堡负隅顽抗，拒不缴械，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我泗宝区队指导员周清华同志不幸牺牲，朱亚民支队长，在指挥作战中脚部负重伤，并阵亡了几位同志。黎明时，部队撤回。伪军也全部逃回上海市区。

周佛海伪军两次敢于进犯我边区，据后来查悉，是接受特务头子戴笠的指示。日寇投降后，戴笠即电令所谓“曲线抗战”的熊剑东司令，通知上海附近伪军，抢占浦西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周佛海伪军里的袁英杰奉熊的命令后，乃率队至七宝遭我堵击，而袁竟向熊谎报战功说，此役杀伤共军甚多，共军损失很大。

朱亚民同志腿部负伤后，由刘长胜同志设法，为其改名、化装，送往上海市区进行治疗，住在上海市内党控制下的一个医院，后因照顾他的护士魏允慈暴露了组织，上海党为了防止万一，又将朱亚民同志转送到苏北，后辗转在山东、大连和佳木斯等地医治养伤。解放后，朱亚民同志回到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负责清剿游匪工作。

（五）北撤前的“上海干部队”和五位特殊人物

“淞沪地委”组织，自曾平同志牺牲后，金子明、张席珍两同志留在浦东，姜杰同志忙于把淞沪地下党移交给华中局新派来的“淞沪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克刚。现在朱亚民同志又负伤，地委委员只剩下陈伟达、陈正之和我三人。除积极部署迎接北撤大军过境的一切准备事宜，一面还要防范伪顽的军事骚扰，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在党中央宣布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长后，上海市内的地下党在极度兴奋中，不少党支部书记和小组长暴露了身份。当奉令北撤时，这些已暴露的同志势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因而这些同志，就撤退到我们地委来，准备和我们一道北撤，计约有一百人。这样我们照顾各方的工作，不免捉襟见肘，力有未逮，于是就把这些暴露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上海干部队”，由朱敏同志为队长，周克同志为指导员，并拨给他们部分枪枝，要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另外，上海地下党还送来五位特殊人物（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安排在地委机关内，随我们一起行动。我们还派了一个短枪班，保护他们。其中有一位是上海市伪税务局长，他在抗战八年中，曾掩护我们的一位同志，长期住在他家里进行敌情侦察，对革命是不无贡献的。但这个人在伪职期间攒聚了不少金条，是当时上海市拥有金条的最多者，所以国民党接收人员吴绍澍一到上海，首先就冲击了他，在他的住宅内挖墙壁，掘地洞，也搜去了不少金条。他自己却坐了一辆保险汽车，带着武装保卫人员，逃到我们这里。这个人生活腐化不堪，鸦片烟瘾特大，后经我们说服帮助，并向他提出两点要求：1、缴出保卫人员枪枝。2、戒绝鸦片。想不到他都同意了，并随同我们北撤至华中局。

（王景三整理）

1989、3、5

为了早日得到解放

奚天然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前进，松江解放已是四十周年了。

在欢庆胜利的节日里，激情满怀，感到无比幸福！

四十年前，松江城东地区和各地一样，处在反动统治白色恐怖下，人民深受苦难。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抗日战争初期，到1949年解放的十年里，为着抗日的胜利和早日求得解放，在城东地区开展地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伟大的解放。我作为当时参加斗争的一员，在解放战争期间的有些事，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难忘的一次转移

一、刘传章来得胜港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疯狂地加紧白色恐怖，镇压和迫害革命力量。

1947年夏，雷霆同志在松江长桥街一个茶室里和我接组织关系，他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在上海的刘传章已被敌人盯上了，必须立即转移”。雷要我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一个社会职业，有个落脚点。我感到时间短，难度大，但想到是党交给的紧急任务，对组织对同志要以党性来对待，在与雷

霆同志分手时说：“保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回城东后，先与华阳税务所所长苏云辉打交道，但不需要人。接着，又与三、四个单位联系，均无办法。以后，再与苏云辉商量有四、五次，终于能在黄浦江边的得胜港（黄浦大桥东边）增设一个税务稽征站。这里僻静、隐蔽、安全。经征得了雷霆同志的同意，不久，在一个傍晚，刘带了雷霆的信来看我，内容很简短：“目前谈妥的一笔交易，现托人前来办理，盼妥善安排”。经与苏云辉联系后，刘就“上任”了。

二、被捕与转移

194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雷霆同志突然来我家中，我意识到一定有紧急的情况。雷说：刘传章在上海被捕，要我迅即转移，并约在莘庄火车站后面的大树边碰头，谁先到，谁先等。如不转移，一切后果自负。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党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立即把组织上给我的文件、书刊交给王华同志烧毁。她为了不使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暴露，镇定又机灵地上街买了二斤多咸猪肉，把文件在锅下烧起来，肉的香味，掩盖了纸灰的气味。文件毁掉了，猪肉也熟了。为了避免敌人的盯梢，从松江乘火车先是向西，然后再换车向东到莘庄站，由于乘车往返的周折，到集合点时，雷霆还有陈伯亮同志先等了。接着，大家到了莘庄镇上地下党员陆

昌裕同志家，陆是个挂牌中医，我们以治疗“慢性病”为由，住在他家的楼上。昌裕同志像亲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日以继夜地观察着外界的动态。但不到半个月，伯亮同志来告诉我们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住在上海祥余里的蔡瑛、还有小沈等两个同志他们三个人被人告密，先后被捕。当时，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着“女共产党员蔡瑛被捕”的一则短讯。我们听到后，有些惊异，那时，伯亮同志镇静地说：“在对敌斗争中，我们的同志被捕的确是件不幸的事。敌人对我们的无情打击，只会使我们的腰杆挺直起来，坚持斗争”。当时，昌裕同志也反映了莘庄国民党区公所很注意我们的行动。伯亮同志沉思了一下，又与雷霆同志研究，接着他说：为了安全，以防万一，决定分头转移。大家还约好，下次接组织关系的地点在上海城隍庙九曲桥南边（第三折）和碰头的地点。那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们就二话没说，立即分头转移了。

事后知道，我们的同志被捕，与十地委被敌人破坏以及金柯的叛变有关。当时，为了有关同志的安全，经组织上在上海的《新闻报》广告栏里登着“蒲石路居民金柯失踪”以引起注意。

三、隐蔽在上海

我撤离莘庄后，在上海住了旅馆，但怕时间长了，可能被敌人发现。以后，经常是这里住住，那里蹲蹲，有不少时候，混在北火车站旅客的人流中，看报、过夜，白天，有时荡荡马路。吃饭，跑小饭摊，甚至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挨过生活。这样做，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节约开支，因为，除了组织上来联系外，对家中和其它熟人是不可接触的，这是个组织纪律。

过了一个较长时期，雷霆同志通知我在

上海卡而登大戏院旁边碰头。同时，华阳桥地下党员张锡荣同志也来了，大家在北面的一家咖啡馆里边吃边汇报、研究，认为华阳桥方面，尚未发现异常情况，是正常的。事后，陈伯亮同志要我在上海南阳桥附近碰头，他把我引到我们去过的一个小茶馆楼上泡了茶，我汇报了避居在上海的情况，他安慰我再忍耐地等几天。临走，伯亮同志习惯地伸出右手一个指头，这暗示我们碰头的任务好了，分头走吧，还约定下次接关系的时间地点。但到了相约的时间，是由雷霆同志来联系，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重回城东，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对刘传章的问题，到解放后才弄清楚，刘是原十地委交给淞沪工委（地委）的联络站负责人。被捕后，由于组织上摸到了他的有关情况，作出了机智果断的处理，除掉了隐患。“文革”中，造反派一定要我承认刘的被捕是我告密的等等，因我坚决否定，受到无尽的迫害，多次被拷打和种种折磨。1985年，我和王华同志并几个老战友，重访了莘庄，陆昌裕同志一家仍住在当年这幢房屋里，我们上楼看了这42年前“生病”的地方，还听着昌裕同志叙说那时在他家的有关情况，听着看着此情此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里

1948年秋，中国革命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济南解放，辽沈战役正在取得胜利。我们按照组织上指示，在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开展武装斗争，经过多方活动，逐步发展成一支命名为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松江大队的武装部队。经过四次袭击敌人，到解放时，有着一百多人、九十多支步枪和轻重机枪4挺、26支手枪。于1949年5月12日接管了松江城东华阳桥地区。

一、一盒礼物

淞沪工委领导陈伯亮同志，曾有二次在华阳茶室接组织关系。伯亮同志来时，总是穿了件上好的长衫，戴着眼镜、大礼帽，像是上层社会高级知识分子或是像伪公务人员的派头。他是实地来了解有关武装活动和城东一带动态，还亲自带来了毛主席《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三个月总结》等文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很巧妙地把这些文件放在一只装糕点的盒子里，在文件上下，放了些糕饼糖果伪装成送人的礼物。当伯亮同志拿来时，有说有笑地讲“送礼来了”。“送礼”，其实是送文件的暗号。在研究好工作后，他又风趣地说：“这些‘礼物’很不象样，请你收下吧。回去要分给亲友，认真点！”“亲友”是指同志，“认真点”是要好好“学习”。我在他的暗示下，拎着“礼物”走时，禁不住眼睛湿润了，感到领导上为了实地了解情况、研究工作和同志们的学习，冒着生命危险，我们一定要好好为党工作。

二、手枪打伤了孩子

1948年冬，淮海、平津战役，节节胜利，我们的武装活动，较为顺利，搞到了一批枪支。有次，与地下党员张小和同志约定在晚上十二时，由我将五、六支各种型号的手枪给“交通”带下乡。但“交通”没有如约到来，我就在家中边等边查看枪支。其中有一支6寸手枪的枪弹上了膛，不慎走火，穿过板壁，打着睡在床上正在翻身的第三个孩子（三岁），弹中左肩锁骨，穿了一个洞。我在危急中，包扎了正在流血的伤口，又匆忙地隐藏好这批枪支，并通过“关系”，弄到了自卫枪执照。天刚微明，急送孩子进城，经过东城门口时，以自卫枪走火为借口，还送了守卫几包三炮台、骆驼牌的好香烟，顺利地过了这一关，在松江茸城医院外科诊治，待痊愈出院。这样，一场严重的事，平

静、顺利地闯过了。

三、被敌通缉

越近解放，反动派越疯狂。1949年春，我离开华阳桥，去松江大队后，反动派在了解到我去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就以“共匪罪”被通缉，我家的房屋被搜查，贴上了封条，家具、衣服用品，被劫一空。由于我是“共匪”，家中一直有保安队占住，房子里还经常养着一大群猪，这批伪军，到解放前夕才逃跑。

四、革命同志被枪杀

1949年3月的一个深夜，反动派从松江押解了12人，在华阳镇东北荒地上，惨予杀害。这12人在就义时，痛骂反动派罪行，有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事件，是在附近的群众知道后讲的。解放初，南通地区有干部来了解过这个情况。

五、从容应付敌军

1949年4月，我武装部队活动的地区为敌军包围，部队作了转移。胡训谟同志和我，当走在松汇路上，经汇桥时，突然，见到有拿枪的敌军把守在桥上。在一无思想准备，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怎么办？是退回来？还是走过去？当时，两人不约而同地使了个眼色，暗示着“顶着头皮闯过关”，并作好了坏的打算。镇静泰然地走向敌军。敌军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训谟同志很利落地回答：“是教书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桥左边有个小学校，于是我也随口说：“是学堂里先生”，还用手向学校的那边指了指。敌军看到训谟同志穿了一套麦尔登呢中山装，两人戴眼镜，真象是个教书先生的样子，回答又干脆，敌军摸摸我们的身上，也没有搜查到什么，就喊了声“走”！我们又从容大步地走过了敌军的岗哨。待走过汇桥时，心中倒觉得紧张、害怕起来。到傍晚，又安然地回到了驻地中渡桥。

六、继续单线联系

我们去武装部队活动后，对在城东各地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继续进行单线领导，通知华阳桥的张锡荣、朱金根、赵景云，新桥的韩鸣皋等党员同志来部队汇报工作，部署任务，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同时，在部队周围中渡桥、荷巷桥、得胜港、车墩一带，部署地下党员王建楚和积极分子陆雪林、王华君、翁炳山、富文羽等同志，提供政情、社情和敌人的动态，有利于部队的活动。

为了部队的巩固发展，胡训谟同志去了莘庄陆昌裕同志那边，了解搞武装的阮同志情况。胡训谟同志与张锡荣同志去茜蒲泾到汪惠民部的驻地，对汪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教育。他还和谈勋同志去浦南吴品章部队联系，摸到了有关情况。

活跃在松江的城西小组

1948年下半年，我们在松江城东地区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搞武装斗争时，松江城区西外莫家弄、白龙潭、塔桥等地，有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对反动派统治不满，渴望早日求得解放，从1948年秋冬到解放前夕，发展到十二、三人，建立了松江城西小组。开展了一些活动。小组以集中、分散和个别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时事，阅读进步书刊、还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小组从1949年2月到解放前夕，开过几次会议，有次在百步坊白龙潭杨家桥一个老百姓家里，有上海来的刘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有小组人员七、八人参加。刘同志讲了北平解放后的大好形势，提出要小组同志团结更多的青年，无情揭露反动派征粮、征草、征兵、苛捐杂税、迫害人民的罪行，要注意反动派的种种破坏等。大约在1949年4月，有小组郑钟乾、庄正诚、周达、沈炳湘、樊玉明、顾克人、宓创之、应相桂、金浪涯等十

多人，在松江西门外莫家弄太平路开过座谈会，提出要搜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动态，做好迎接人民解放军的有关工作。小组开展了宣传活动。油印《新民主主义论》有关章节和《城市政策》，编印《告人民书》和解放区的革命歌曲。到4月底5月初，小组有的人在城西一带，分人、分地段，张贴了《告人民书》和散发了革命传单、口号。反动派军警进行了查抄。

小组有的同志在松江火车站、新南门等地搜集敌军动态，在松江团管区了解到征兵和资料上的有关情况。还对亭林的一个藏有几支步枪的保长做他工作，后因情况有变化，未成。

5月上旬，有小组送信到我们松江大队汇报城西活动情况。在松江解放后的第一天，有宓创之等同志来华阳桥，汇报松江解放有关情况。

在华阳桥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九兵团二十军的一个团长，要求地方上能动员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的部队。有小组的郑钟乾、樊玉明、陈权衡，还有两个女教师，经解放军部队的批准，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欢欣鼓舞迎接解放

一、松江大队接管华阳桥

毛主席、朱总司令在1949年4月21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进军，歼灭一切敌人后，南京等地解放。5月10日，得悉我解放大军已从嘉兴等地接近松江，向上海接近。我们召开了浦东总队松江大队的指战员大会，讲了解放军渡江后大好形势和松江即将解放的消息，要大家在5月11日晚饭前做好战斗的准备，待命行动。5月12日清晨天气晴朗，我们部队在上海县中渡桥东驻地发布了进军命令（那天正是解放大军向上海外围进攻的日子）。我们身穿蓝军装，（部分）

左臂套上红袖章，满怀战斗的激情，向华阳桥行进。当时，我们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眼看着长期为之奋斗、日夜盼望解放的日子来临，欣喜若狂，感到浑身是劲。在到达华阳桥镇时，知道敌军已逃跑，我解放大军尚未到达，部队暂驻在镇东顾家祠堂。

先是，在镇周围布防放哨，接管了华阳桥镇公所。在全镇人民欢庆声中，镇公所楼顶升起了解放后第一面鲜艳的胜利红旗，迎风飘扬。同时，劝告大家：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维护好地方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行各业要安心生产、工作。

二、欢庆松江解放

1949年5月13日，是一个难忘的大喜日子，松江胜利地解放了。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的侦察部队到达城东地区，接着，九兵团二二七团一个营也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人民见到戴着五角红星、佩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解放大军，威武雄壮，精神饱满，秩序井然地进镇时，全镇人民一片欢腾，禁不住高呼：松江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在镇机关召开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松江的大会时，大家还和解放军一起学跳秧歌舞，歌唱《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以欢庆松江和城东解放。胜利的喜悦，激动的心情，终身难忘。

5月16日上午，胡训谟同志和我去城里向松江地委、市委、市军管会汇报城东解放，和我们部队接管等情况，领导上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见到顾复生专员时，不禁回忆起1945年10月到青东观音堂学习，和大军北撤时，与陈伟达、姜杰、顾复生等领导同志在一起时的情景，感到更为亲切。这次能在解放后的松江又见到了老领导，更为高兴。还知道松江的主要党、政、军机关和领

导大部分是在5月12日从苏州经吴江到平望，分别在13、14日随军进入松江的。临走时，我们还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华堂、松江专员公署专员顾复生、松江市长吕炳奎的三种布告。事后分散在城东各乡镇张贴。

三、日以继夜地支援前线

松江解放后，三野九兵团的部队，一批又一批的不分昼夜地经过城东地区。解放军冒着黄梅雨季的大雨，不分干部和战士，在风雨泥泞中，忍受着困难，忘却了辛劳，沿着公路、铁路向上海推进。解放军的好榜样，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至今记忆犹新。

有次，解放军九十三师的师部作战参谋，了解到我们松江大队有一批松江、上海一带的军用地图，要来购买。这批地图，我们是在解放前夕通过松江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关系买来的，图很详细，一个村落、一条小河、一座小桥、一片竹林以及大的基地均标绘出来。全套图纸，约有二、三十斤，为着解放大军解放大上海的急需，就全部无偿地送给了师部，受到了师部的赞扬。

当解放大军向上海推进时，我们动员懂得修理的技术人员、建筑工人，并调动了民工，检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和被炸坏的桥梁。同时，为解放军筹运粮草，华阳桥镇共筹粮二十多万斤。有次，我们和解放军的一个团部，紧急筹运粮食三万多斤，装上大小船只几十条，运送到上海县马桥东一个驻地，以便转运去上海前线。当时天已黑了，还下着大雨，不时见到上海方向火光闪闪，炮声不断地响彻夜空。大家身上的衣衫都湿透了，也很疲劳，但为了早日解放上海，忘却了一切，继续赶路。当回到华阳桥时，已是次日下午二时了。

人民解放军在上海战役中，经过半个多

月的激烈战斗,到5月27日,全市全部解放。就在解放后的那天,沪杭铁路的火车就开到了松江。这样,许多因上海尚未解放和交通的阻隔而滞留在各地的人们,回到了家乡,与亲人见面。当时,因为石湖荡铁桥被炸毁后,尚未修复,使沪杭全线未能通车。

四、担负着新的任务,努力工作

松江胜利地解放,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的活动,也胜利地完成了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原在松江大队穿着的蓝军装,换上了黄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上了军管

会的臂章,精神焕发地开展了支前、剿匪、反霸、肃特、减租、减息、建立区乡政权等各项新的工作,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在纪念解放4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回忆过去,唤起无限激情。面对现在的大好形势,我们要怀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长期奋战流血牺牲的先烈!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愿在有生之年,为改革和建设继续发挥余热,作出应有的贡献,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平望

解放松江散记

叶 恭

1949年4月,我党我军在取得了伟大的辽沈、京津和淮海战役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蒋介石不能不来个假“引退”,退到幕后指挥。前台推出李宗仁,来个假和平,以拖延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毫无结果,于是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战斗号召,提出了“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两个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震撼了大地。

在解放区,真是热闹非凡,可以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人沉浸在热烈的情绪中。各级组织都在布置任务,讨论措施。久经考验的解放区军民在这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地去争取任务,青年人要求参军,中年人要求作随军后勤,老年人和妇女要求在家做好生产和家务劳动。我

当时在靖江县工作,县委开一次参军大会,一下子有干部和群众3000余人报名,为全专区作出了榜样。

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玩弄手段,我党已不象1927年那样幼稚的党了,我党我军一举南下,于4月23日解放了南京。以后,各个兵团、纵队都迅速南下。当时我们苏中区党委的任务是全面接收苏南地方工作。于是苏中区党委首先把党委领导班子一分为二;另外,还派组织部副部长陈一尘同志带领几名干部,于一星期内,要把支援江南的各个县的班子组织起来。当时我跟陈副部长搭上前线交来的一辆吉普车,在一个星期内跑了全部有关市、县,把各县的主要领导成员初步确定,回到苏中区,请党委去通过。当时的干部思想上是一致的,只要组

织上决定去留，就坚决照办，毫无问题。至于实际困难，再商量解决。所以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如期完成了任务。

我当时分配在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在机关过江时，负责人是宣传部副部长盛华同志。我们大家都没有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渡江战斗，以为一定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情景。谁知当上级通知我们在下午渡江时，我们不禁有点惊异。渡江前紧紧跟上队伍到了六圩上船时，发现四周非常平静，不但没有炮声，连枪声也没有，于是大家倒有些松散起来了，一扫紧张的心理状态。但船到江中心，有人发现在船的西北有两架敌机在船头上空盘旋，既不打枪，又不投弹，转了几个圈子就溜掉了。

其实，我们的前方部队已经英勇地解放了南京，连镇江、无锡、苏州、江阴等城市也都解放了，急需地方工作跟上去。我们过江后，先在江阴南面的农村休息，随时待命出发。

正在这么一个战斗十分紧张，但我又十分空闲的几天时间里，在我思想上作了激烈的斗争，因为我是松江人，在松江生活过十五年，所以对松江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热爱松江和我热爱祖国一样，我离开松江也十五年了，让我用回忆过去的松江和对比目前的松江这个方法，看看十五年来到底起了些什么变化。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打了个报告给组织部，要求到松江去工作。当时松江这套班子里，恰恰缺少松江人，于是组织上就批准我的要求，让我到松江去工作，并要我立即到无锡拿介绍信，连夜赶到苏州，找松江地、市委班子。于是就和通讯员等三人连夜出发。那时虽在战时，但向东的火车可以开到浒墅关，我就搭上火车到浒墅关，又摸索了一阵子，才到达目的地。

那个战争时代，白天和黑夜是难分的，

只要工作需要，黑夜就是白天，工作略有空隙，白天就是黑夜，所以有时连日期也记不清了。我记得是五月十一日夜离开苏州，部队从苏嘉铁路步行前进。我们这支部队是地方部队，行动较慢，不过那时锻炼得能在十五分钟内集中出发了。我们这次行军，大家走得都很快，似乎一定要追到敌人，来个歼灭敌人的战斗。那知敌人早已给我前方部队打得龟缩到上海去了，所以我们一路上风平浪静。一直走到半夜，有两架敌机，丢了两颗照明弹。我们都进入隐蔽状态，实际上是让大家休息一会儿。等到敌机的机声没有了，我们又继续前进。

我记得是在5月13日晨，到达嘉兴的。这时，我前方部队也解放了松江。我们于下午继续行军，路上没有看到激战的痕迹。到了枫泾，要去金山的队伍，去上海、奉贤的队伍都和松江的队伍分手了。但大家也没有举行仪式，只是拼命向前。

我们开始走农村的道路了，这比走铁路要困难得多，好在天帮助，没有下雨，否则就更难走了。当我们走到松江附近的一个小市镇时，看到五、六个不三不四的汉子，他们找我们要请吃饭。我们的地委书记答复：“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事务长给伙食费，给足他们。”我观察一下这几个角色时，既有尊敬的一面，又有畏惧的一面，他们尊敬解放军纪律严明，惧怕的是解放军铁面无私。我们吃过阳春面后，立即出发。当我们走上跨塘桥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和我一样轻快起来。当时的专署公安处长赵一德同志，悄悄地和我开玩笑说：“老朱（我在苏中名朱进），我们把你送回家啦，你应该好好地请次客。”我笑着答复：“首先是松江人民会感谢我们的。至于请客，那什么时候到我家都可以。”我，这个第一批进松江城的地方干部，就这么轻松愉快地

进入了西门。我记得进城的负责干部有张彦、周一峰、顾复生、吕炳奎、余克、陆恂如、叶恭等十四人，还有北方部队的司令廖昌金，以及朱亚民等。入城后，第一次军管会是由二十九军军长陈华堂同志主持。我记得陈军长说明松江不举行入城式的理由，以及救济贫民、稳定市场物价等等。语言不多，却非常精悍，很有说服力。散会后，把军管会的安民布告到处张贴，做到家喻户晓，而陈军长到上海前线去了。

当时我们对松江的情况不很清楚，所以想很快的与地下党联系上。除了我能单枪匹马去找老同学、老同事之外，其他的线路都未接通。我们只知道松江地下党是相当强的，但大部分在当时的松江县地区如华阳桥、泗泾、九亭等农村市镇上，工作方式也如《沙家浜》这种形式，帮浦东支队工作，所以在松江城市内部的地下党是受上海市委农村工委领导的，以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缪鹏同志为首的一个支部，还有两位就是当时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回松的党员赵宁禄、丁冠平，还有点外围组织如读书会等，他们的宣传工作也相当成功，影响很大。

当我们急于开展工作，找地下党，找各种关系时，有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带了她的弟弟来市委要找市委书记或组织部长，自称是长征失散干部，于是市委决定我先去谈一次话。经第一次谈话，了解她是松江人叫姜兆麟，在校绍裘同志办的松江景贤女中工作过，入党后到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会计，与陈云、瞿秋白等同志很熟悉。长征时她和秋白同志等分配在一个小组，中途被捕。秋白同志牺牲后，她因坚持自己是个老百姓，所以被释放了。后来到松江埋伏下来，一直至今，现在要求恢复党籍，重新工作。后来在县委会上通过了她的重新入党的决定，介绍人是市委副书记余克和叶恭两个同志。她

入党后，老当益壮，为党作了不少工作。

正当我党我军在松江工作逐步开展时，突然来了次13号台风，把松江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清洗”了一下，许多危房被吹倒，电灯电话的线路也不通，幸而地委早有布置和防范，农业方面由顾复生同志率领抗灾大军到金山海塘坐镇，因此，城市和农村都没有什么伤亡，得到群众热烈的赞扬，都说共产党有办法，这样大的灾难都防止过来了，增强了大家建设的信心。

松江地委为了庆祝松江解放的胜利，为了松江抗灾救灾的胜利；为了庆祝上海解放的胜利，召开了一次全市性的大会。我记得地点是在岳庙附近的一家草棚子内，党、政、军、工、农、青、妇都有代表发了言，会议气氛相当热烈，进一步增进了对松江人民的感情，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新中国。

由于松江地区的地理位置在上海的周围，所以华东局决定土改运动以松江地区为试点区，意思是要各项工作先走一步，试想一下，什么是可以干的，那些是不可以干的。例如在松江土改时，没有提出“农民老爷坐大堂”的政策，就是提高了许多农民的阶级觉悟，政策、策略都掌握得很好。在松江试点中获得了经验，避免了过去在山东、苏北打地主的经验教训。

在这里还值得讲一讲的是松江的青年运动。

松江的青年比较诚实、诚恳，例如经过他本人独立思考而选择的道路是要走到底的。我记忆里，松江有个中学生，小时患有小儿麻痹症，后来留有后遗症，走路时双脚无力，要用拐杖，他学习马列主义很努力，别人劝他还是学习别的业务，将来可以谋生，他却坚信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精神，一定要学习这种精神。现在40年过去了，他这位中学生已在

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多年，教育出许多学生，在建设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在松江青年中留下了个美好的形象。

在土改时，松江的青年运动也随着党的领导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为党在土改中起到助手作用。为此，松江青年还得到过好评。当时，松江公安处还在松江青年中吸收10名公安干部，经过40年的锻炼成长到现在，都成为公安部门的骨干了。

松江解放已经四十年了，也经历过复杂的斗争，有些文史资料已给“文化大革命”毁灭，成为无法挽回的损失。现在，时过境迁，只能凭个人记忆，写一些一鳞半爪的东西，供作参考。同时，我相信，在这四十周年纪念后，将又有一批干部要退下来，可以写出更完整的文章来。祝愿松江城将有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胜利！

忆接管松江县的南下干部队伍

张 志 全

我有幸参加1949年南下干部队伍，参加接管松江县的工作。1989年5月13日，是松江解放四十周年，回忆往事，记忆犹新。在庆祝解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这支队伍的组织、工作、学习、生活的片段，以作纪念。

队伍的组织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已赢得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京津战役的伟大胜利，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地区外，已基本消灭，幸存的也已逃到长江以南。解放区的军民提出了，“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口号已成为当时解放区军民的主要任务。干部的选拔培训，是当时的一项主要工作。解放区的县委党校，地区党校，省委党校，华东大学，都在培训干部，要求每个地区，县、区各级都配备两套班子，一套南下，一套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南下的干部一般都进党校或干部学校学习，这次学习，

进一步使广大干部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克服南下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春节以前，去留对象已明确决定，对南下的干部亦作了动员。春节过后，山东南下的干部集中在滨北地委，一般一个县编为一个中队，但也有两个县或几个县混合编队。我们胶南县的部份干部，与诸城县的干部，合併编为一个中队。滨北地区南下干部，编为华东干部队伍的第五大队。我们的队被编为三中队，计有80多人，这就是接管松江县干部队伍的基础。在渡江前后，又从华东大学、华中大学编进了一些青年学生，从部队转业干部中分配来了几位同志，南下干部队伍到松江县时已有100多人。

在前进中学习

我们的队伍集中在滨北地委时，进行了短时间学习。学习了形势，明确南下的任务，编队建立组织，学习行军的组织纪律，

和一切行动的规章制度，保证行军任务的完成。

队伍组成以后，由大队政委张彦、副政委李仲林、大队长王东年作了动员。他们都是原来滨北地委正副书记，专员公署的专员，现在又成了这个大队的领导。每人都发了军装，解放军符号，枪枝弹药和干粮袋，全副武装，从滨北地委出发了。第一站到了胶济铁路上的潍坊市，乘上火车。这火车的战争痕迹是很明显的，火车都是敞棚，有的车厢没有挡板，乘坐这些车厢的，只好四周用绳子拦一下，以免刹车时，把人抛出车厢。春节之后，还是寒冷季节，干部虽是全副冬装，但车开起来还是寒冷难当，于是大家就把被头裹在身上，以御寒冷。火车总是开开停停，开得很慢，大概是因为军队、军火、军需物资的转运，不得不将我们乘的火车停下，让他们先走。乘这火车条件虽然很差，但比步行还是快得多，省力得多。火车驶过济南以后，我们就下火车了，开始了徒步行军的生活，每人带几十斤行李，每天还要走一百里左右的路程，是很吃力的。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人不适应，到了晚上，脚起泡了，腿酸痛得很。队部给大家准备热水烫脚，安排好休息，减少大家疲劳，以适应第二天行军。

队伍到了津浦铁路上的临城，住扎在微山湖东北一带的农村，开始了整训学习。这次集中学习了解较长一段时间，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报告、文件，认清革命形势，明确新区工作任务，从过去的乡村包围城市，到1949年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明确了在城市党的中心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

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实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並提出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必须引起全党的警惕。嗣后，又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军，到达江苏省原九分区的平潮一带，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学习，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以及如何做好接管工作等等。这些学习，不断提高干部的革命自觉性和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参加学习的同志，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但他们学习认真，刻苦钻研，把学习作为革命的本钱。当时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没有课堂，就在地地上、树林里听报告；没有书，就靠自己记录。由于学习变成了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学习中的困难也就容易解决，并把学习到的内容，以实际行动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到了新区工作岗位以后，每一个同志很快适应了新区工作，这和每一个人的认真学习是分不开的。

4月中旬，队伍又开始向南进军。这次行军是准备渡江，要求每个人轻装，随身所带行李，不得超过规定的四公斤数量，这样，把大量的行李丢弃在长江以北。这次行军，因距敌占区较近，白天敌机到处轰炸，所以均在晚上行军，这比白天行军艰苦得多。有一天，接队部通知，今天的路程较远，要早出发。队伍在天黑之前，已在公路上行军了。这天，公路上的行人特别多，南来北往，有武装部队、干部队伍、运粮民工，还有大批俘虏，真是人山人海。突然，敌人轰炸机来了，就地卧倒的防空命令，各部队就迅速下达了，公路上所有的人，很快就在公路两旁隐蔽了。唯有俘虏这个队伍较乱，但押解俘

虏的部队，很快占据了制高点，命令俘虏不准乱跑。解放军则架起机枪，对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只好高空乱丢炸弹，命中率极低。敌机一走，行军又开始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我们干部队伍，也接到了渡江的命令。我们从江阴渡江，所乘的是小木船，一只船只能乘十多人。我们上船，天还未黑。这天，敌机又来轰炸，炸弹激起的水花有几米高，船只散在长江水面，到处都是，所以它的命中率是很低的。这天天气很好，长江上风平浪静，我们的队伍很顺利地渡过了长江。江南的春天，细雨连绵，我们都要在晚上行军，走的都是泥泞小路，因此行走很难。我们北方人走这路很不习惯，更增加了许多困难，原来跟随队伍的民工，都从北方带来的独轮小车，在这泥泞的小路上，根本不能走，只好丢了小车，将东西用人工肩挑背负。我们的队伍过江后直奔苏州，因上海尚未解放，就向嘉兴方向进军，又回头顺沪杭铁路往东北前进。铁路上的几座大桥，被国民党逃跑时炸毁，火车不通，只好用木船搭起浮桥，使队伍通过。5月19日晚上下大雨，队伍从枫泾以西，一直走到华阳桥镇上，住在一家私人轧米厂里，所有的行李都淋湿了，队伍走的十分疲劳。第二天，即分别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办事处。

战争年代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除吃饭外，有很少的菜金，多数是素菜，荤菜每月有一二次，名曰改善生活，但对病号有特殊照顾，可以吃一点小灶。由于领导和群众吃的一样，虽苦也无怨言。最艰苦的是行军，但革命的友谊，战胜了各种困难，身体强壮的帮助身体弱小的，拿行李、

背包、干粮袋。如有病号，还用担架抬着走。队伍中有几位女同志，困难较多，在江南的泥泞小路上走路困难，要由身体强壮的同志搀着走。由于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克服困难，没有一个人掉队。队伍纪律严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处，不准增加群众的麻烦，晚上睡觉借用群众的稻草打铺，早晨都要捆好归还，借的东西，照样归还，损坏了按价赔偿，临走时打扫好卫生，这些行动均受到群众的好评，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优良作风。

接管工作开始了

松江分设松江市和松江县，松江市政府设在松江城内，松江县政府驻泗泾镇，均属松江专员公署管辖。

松江县下属泗泾镇和六个办事处。第一办事处为新桥，第二办事处为城西，第三办事处为亭林，第四办事处为漕泾，第五办事处为石湖荡，第六办事处为枫泾。每个办事处配有十名左右的干部，设办事处正副主任、中共党委办事处正副书记、及其他办事人员。各办事处下设若干乡或镇，乡长、镇长均由我办事处工作人员兼任。

到达接管地点以后，每个乡、镇都召开了规模很大的群众大会，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申明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经过宣传和我们的实际行动，安定了人心，消除了顾虑，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首先与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组织接上关系。松江县在天马、新桥、华阳桥、叶榭、漕泾等地，都建有地下党的组织，他们